

全球文明倡议专题

# 新时代中国外交之礼治根源\*

## ——以全球文明倡议等四大外交概念为例

薛力 席寒婷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梳理“礼”在中国西周、西汉和北宋三个代表性朝代中的表现形态，总结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基本特点，并据此分析全球文明倡议等新时代中国外交四大代表性概念，以帮助理解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礼治之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新时代中国外交是新礼治秩序的一种实践。伙伴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大抓手，前者继承了中国传统礼治的“尊尊”“亲亲”思想，后者可追溯至古丝绸之路所象征的中国传统礼治秩序在地域范围上的扩展。全球文明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领域的实践，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文化领域的升级版。全球文明倡议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周公测礼。从“道器”思想视角分析可发现，全球文明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它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提供内在之“理”。全球文明倡议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对立统一与包容性，这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二元对立思维形成鲜明对比。全球文明倡议适应了新时代对平等性的普遍诉求，也凸显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具包容性的特质。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外交 礼治 新礼治秩序 全球文明倡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薛力，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云南大学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特约研究员；席寒婷，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4) 02-0002-20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文化根基研究”（编号：2023YZD049）的阶段性成果。

“礼”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启中国传统礼治时代到清朝结束，中国的礼治秩序道统近三千年，从汉代复兴礼治秩序算起，也有两千余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礼治思想已沉淀为中华文明关于天下治理的主要指导思想。时至今日，中国推行外交方略与政策时，依然从中汲取养分并赋予现代意义。

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包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外交工作者的实践中，也体现在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概念中。袁明认为，中国近代外交“是加入了自己的思想文化底蕴的。这种融合，不但要从政治史，而且似更要从政治思想史中去寻找轨迹和线索”<sup>①</sup>。这是她对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儒家外交”的评论。彼时的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外交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都处于草创期，外交官的诸多外交行为带有比较明显的个性痕迹。而今，探寻中国外交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已成为构建中国外交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路径，并诞生了天下体系说、道义现实主义、世界政治关系理论、共生理论等。<sup>②</sup> 这些理论均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实践中汲取养分。其中，天下体系理论以“天下”为核心概念，以周朝体系为时代背景，探索周朝的“天下无外”体系对于建立理想世界秩序的启发意义；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中国先秦的“王霸”思想与现实主义理论相融合，指出物质权力和道德权力的结合是中国获取全球领导力的必要条件；世界政治关系理论以“关系性”为核心概念，阴阳关系、中庸辩证法和关系性逻辑构成关系理论的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依据；共生理论以古代中国的共生思想为出发点来思考世界秩序。2021年，潘忠岐领衔的著作《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出版，对“阴阳”“太极”“仁”“天下”等20个中华经典概念进行追根溯源，并分析这些传统文化概念在当代中国外交精神中的体现。<sup>③</sup> 该著作代表了中国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以期创建“中国学派”

<sup>①</sup> 袁明：《对中国外交“思想底色”的印象与感悟》，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4页。

<sup>②</sup> 参见赵汀阳著：《天下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阎学通著：《大国领导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秦亚青著：《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任晓编：《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sup>③</sup> 2023年12月4日，《孙子兵法》编辑部举办学术讲座“战略文化对话”，该著作的著者之一陈康令在发言中介绍，该著作对于中华国际关系概念的写作包含五大特点：说文解字、古今联系、中西比较、中为西用、古为今用。参见潘忠岐等著：《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努力。

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探究当代中国外交的礼治思想根基十分必要。直接探究外交概念的礼治根源者尚比较少见。值此中华文明走向复兴之际,深入探究当代外交概念的传统文化根源,不但具有外交实践价值,对于重塑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亦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我们看来,当今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格局与其说具有地缘政治特征,不如说具有文明间政治特征。这主要表现为“文明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特征,局部冲突或会发生,但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我们研究发现,新时代中国外交依然具有鲜明的礼治特色。新时代中国外交从理念、总目标到实践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它包括一系列新概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伙伴外交、“一带一路”、三大全球性倡议是代表性概念。其中,全球文明倡议不仅是最新提出的概念,而且为其他两个全球性倡议奠定文明根基。探究这些代表性外交概念的传统礼治根源,并分析它们在新礼治时代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把握新时代中国外交与传统礼治思想的关系,从而深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认识。

## 一 礼之历史

中国的传统礼治秩序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国家产生前,古人通过击鼓献玉向神祈求幸福,这就是甲骨文中“礼”字的含义。从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到北宋朱熹以“理”释礼,再到清末“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治导致“礼教吃人”,中国传统礼治社会已维系约三千年。因此,阐述“礼”的内涵是把握中国传统礼治的关键。西周、西汉和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推行“礼治”的三个标志性朝代,本文通过透视礼治在这三个朝代中的发展形态,借以把握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主要内涵与特征。

### (一) 礼之缘起——祭祀神灵

礼在甲骨文中为“𡇗”<sup>①</sup>,上面的𡇗代表玉串,下面的𡇗代表鼓。礼在古文中是“禮”,《说文解字》释“礼”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sup>②</sup>由此可见,礼缘起于祭祀神灵的活动,古人希冀通过击鼓献玉、祭祀神灵而获得幸福。夏商时期关于礼的记载并不全面,所以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

① 刘钊、冯克坚主编:《甲骨文常用字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7页。

② [汉]许慎著:《说文解字》(现代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页。

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sup>①</sup>但可以确定的是，周礼是在夏商时期礼的发展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这可从孔子所言之“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sup>②</sup>，“周监于二代”<sup>③</sup>中得到论证。

西周时期，礼已发展为较成熟的形态，并成为当时君王治国的重要依据。钱穆同意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判断“五经为古者王官之学，乃古人治天下之具”<sup>④</sup>，并认为《诗经》和《尚书》是五经中最古老和可信的两部。其中，《诗经》又被称作周代的百科全书。从《诗经》的“四始”<sup>⑤</sup>中体现的夫妻之礼、君臣之礼、天人之礼、祭祀之礼等“四礼”所涵盖的礼治范围可得出结论：“礼治”在中国古代君王的“治天下之具”中占据重要位置。

## （二）周公制礼——“人”之进入

钱穆认为《诗经》与周公制礼有关：“今果认诗经乃古代王官之学，为当时治天下之具；则其书必然与周公有关，必然与周公之制礼作乐有关。”<sup>⑥</sup>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认为周礼是治理国家的至上制度，“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sup>⑦</sup>。因此，探索礼治不可绕开周公制礼作乐。可以说，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中国传统礼治时代的正式开启。通过考察周公制礼作乐，可窥见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原始面貌。

周公制礼作乐之目的乃是保证周朝世代相传，这可从《时迈》中加以印

<sup>①②③</sup>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5页，第29页，第39页。

<sup>④</sup> 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第99页。

<sup>⑤</sup> 《诗经》的“四始”是指《诗经》的《风》《小雅》《大雅》和《颂》四部分的首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的合集。《史记》对《诗经》“四始”作如下介绍：“《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参见陈曦等注译：《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5025页。“四始”被认为将《诗经》的义理讲到极致。《毛诗序》指出，《关雎》的作用在于端正夫妻之礼从而教化天下，使百姓和国家都能有序。参见王秀梅译注：《诗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毛诗序第2页。《鹿鸣》描写周王召见臣子嘉宾共同畅怀宴饮的场面，展现了理想的君臣之礼。《文王》由周文王的儿子周公旦所作，意在歌颂周文王顺应天命建立周朝，以德政管理百姓，并告诫后代君王顺应天道，遵守天人之礼，不要走殷商覆灭的老路。《清庙》是祭祀周文王的乐歌，描写祭祀者神情庄重，志在秉承周文王的德行，敬仰之情永不消退，体现了祭祀之礼。

<sup>⑥</sup> 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第100页。

<sup>⑦</sup>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9页。

证。<sup>①</sup>周武王于去世之际将大权交给弟弟周公，此时的周朝正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周公平定天下后将大权交还予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周公便是值此背景下创作出《时迈》，他在篇中告祭周武王，如今天下已定，他将谋划制度以确保周朝世代永继。周公制礼作乐的实质，是在殷商天命观的基础上注入周朝的统治思想“明德”，将人文观念注入原本神鬼观念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中。从殷商覆灭可以看出“天命靡常”<sup>②</sup>，而殷商没能保住国家是因为丧失民心，周朝应吸取殷商灭国的教训。周公认为，要确保周朝国运昌盛，就必须学习周文王的治国理念，“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sup>③</sup>，唯有明德慎罚，天子才能遵天命、获民心。

从具体制度上来看，封建<sup>④</sup>、宗法<sup>⑤</sup>和井田<sup>⑥</sup>三者构成周公开创的礼治。它们分别从政治、伦理和经济方面入手治理周朝并相互融为一体，三者成为体现周公“明德慎罚”思想的施政制度。钱穆在考察这三种制度后认为，周公制礼作乐的最大要义是个人道德的确立，这也意味着天下大同观念的确立。因为周朝统治所依靠的封建制背后是宗法制，而宗法制推到极致便是个人。“故推极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启其端。故论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最深义，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又即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sup>⑦</sup>王国维考察上古至周代的制度所得出的结论与钱穆的观点在本质上相通，他们都认为周公所制之礼的内核是确立人的道德，“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

① 《时迈》是《诗经》里《周颂》中的一篇。它由周公所作，旨在歌颂周武王开创周朝，并向天下宣告周朝的威望和美德。参见王秀梅译注：《诗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51-752页。

② 王秀梅译注：《诗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79页。

③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80-181页。

④ “封建”一词最初的含义是给诸侯分封土地，划出界限，并为这些土地立法。封建制并不由周公首创，夏商已有封建诸侯的历史，但夏商时期的诸侯国相对独立于王室。商朝在王畿以外分封异姓诸侯，在王畿内才以商王的同姓亲族为主体力量。周公实行封建制的初衷是保证周王朝一统天下，他认为夏商亡国的重要原因其宗族没有帮扶王室。因此，周公大力分封姬姓（周王姓氏）诸侯，以此作为保护周王权的手段。在周公分封的71个诸侯国中，姬姓诸侯占据53个。由此可见，周公实行封建制的根基在于宗法制。参见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0页。

⑤ “宗”的最初含义是祭祀祖宗神位的地方。宗法制的建立是让周的政治制度倚靠于宗法制，即社会伦理，社会伦理则最终推演到个人的孝悌。

⑥ 井田制在夏商时期已经存在，周公对其进行了完善，为他推行的封建制提供保障。《周礼》记载了西周时期井田制的形态，证明井田制是当时基本的土地、人口、分封以及赋税单位，“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参见吕友仁、李正辉译注：《周礼》，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

⑦ 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第88页。

有别四者之结体也”<sup>①</sup>。

### （三）礼之“天”化——君承天命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礼治难行。对于恢复礼治秩序，秦朝厉行峻法而无意于此，汉代初期为恢复国力而以黄老之术治国，也未能实现。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恢复，吸取秦朝二世而斩的教训，建立稳固的天下治理体系成为天子考虑的重心。汉武帝为经略国家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sup>②</sup>，将“天”变成统治国家的思想源头，“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王者承天意以从事”<sup>③</sup>。君王统治国家乃承命于天，这就为汉武帝治理国家的正当性提供了思想基础。此外，先秦儒学没能在汉武帝之前的中国统治阶级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儒学官方正统地位之确立，董仲舒厥功至伟。“天人三策”不仅成为汉武帝治理国家的思想纲领，也为此后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和等级秩序社会打下深厚根基，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礼自此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执政纲要。

董仲舒认为，阐述天、地、人之关系的一整套完整哲学思想的提出，是实现天下稳定有序的必要条件。在天人关系上，董仲舒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融入了道家与阴阳五行家的宇宙观思想，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在民众价值观统一上，他尤其看重《春秋》，特别是其中的大一统思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为此应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sup>④</sup>。在天子与民众的关系上，他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sup>⑤</sup>。天子统治百姓乃是天命所授，天子应顺应天道实行统治，任德不任刑，“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sup>⑥</sup>。这样一来，董仲舒就把天、天子、天下按照等级连

<sup>①</sup>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陈其泰、郭伟川、周少川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300页。

<sup>②</sup> 董仲舒向汉武帝呈上的三篇文章被后世称作“天人三策”。秦始皇采纳李斯的主张焚书坑儒，意图完成思想一统，但其残酷统治导致秦迅速灭亡。汉武帝也想实现思想的统一，但秦的严酷做法已被证明不可取。在这个背景下，汉武帝问政于董仲舒，董仲舒以“天人三策”作答。其主旨是“天人感应”、任德不任刑、礼乐文教三方面，分别从整体思想、政治原则和施政手段组成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的儒学体系。

<sup>③④</sup> [汉]班固著：《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04页，第1918页。

<sup>⑤</sup> 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00-401页。

<sup>⑥</sup> [汉]班固著：《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04页。

为一体，形成“天人合一”学说。社会政策方面，董仲舒在性情论<sup>①</sup>的前提下为维护社会秩序提出“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体系。“纲”的最初含义是“维纆绳也”<sup>②</sup>，即网的大绳，引申为总领。董仲舒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为“三纲”，臣、子、妇分别以君、父、夫为纲。“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伦理观念，其作用是实现“三纲”所代表的社会等级秩序。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之具有“独尊儒家”色彩的治国建议，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与奖惩措施，使中国形成以儒家为核心的一整套价值观体系。这对于维系天下人心、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与天下体系的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解决了秦代因为片面强调严刑峻法而引发社会强烈反抗与天下体系不稳定的问题。汉代因而成为天下礼治秩序的成熟期。此后的朝代虽然对此有所调整与改进，但整体上不出汉代的范畴。

#### （四）礼之“理”化——“礼即理也”

宋代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期，五代十国留下的战乱局面才得到修整，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和宗法关系的松动又导致人欲横流。如同汉代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后重拾礼乐教化，北宋也亟须修复礼治巩固政权。儒学的主导地位此时已叠受玄学、佛教和道教的冲击，不过儒家“仍能长期成为中国文化的支配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在礼制的层面上抵御了佛、道的侵染”<sup>③</sup>。

宋代儒学以论“理”为主，朱熹作为宋儒的代表将程颐开创的理学发展完善，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之前，程朱理学始终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sup>④</sup>，并对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儒家文化圈产生了

<sup>①</sup> 在人性观上，董仲舒融合了孟子和荀子的主张。他以阴阳为根据提出性情说，性对应于人身的仁，情对应于人身的贪，“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参见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76-380页。孟子认为人有善端，人“已善”；董仲舒则认为人本身是“未善”。董仲舒把善和性比作禾与米的关系，人虽然有仁之性，但性不是善，性需要教化才能转化为善。由此可见，董仲舒的人性主张与荀子的人性论具有共通之处，荀子认为礼的缘起在于人性之恶，人性需要礼的外部约束。与荀子人性论不同的是，董仲舒并不认为人性本恶，人性转变为善是发展人性而不是约束人性。董仲舒认为，人需要教化才能将人性的仁德转变为善。

<sup>②</sup> [汉]许慎著：《说文解字》（现代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34页。

<sup>③</sup> 杨志刚著：《中国古代礼学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3页。

<sup>④</sup> 冯友兰著，赵复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第232页。

深远影响。朱熹的礼学则是理学体系的关键部分，在他看来，“礼即理也”<sup>①</sup>。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可被概括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状是此器”<sup>②</sup>，“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sup>③</sup>。也就是说，理是“器”之“道”，“器”是理之“发”，有一物便有一理，有理后才有物。在天人关系方面，朱熹以理释礼，认为礼是天理的外在体现，是管理人间秩序的规范。至此，朱熹把礼作为中介将人与天理连为一体，人通过礼受制于天理，而这同时又是顺乎天理之自然。朱熹继承了董仲舒关于“三纲五常”的观点，认为这是“礼之大体”，礼的固定部分。通过将礼与天理连为一体，朱熹将“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等级秩序的正当性进一步推至“天理”，即自然天定。<sup>④</sup>由此，程朱理学把礼的内涵抬升至“天理”的高度，北宋礼治思想逐渐从关注礼的外在形态转向关注礼的内在精神，实现了形而下向形而上的提升。<sup>⑤</sup>

表1 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历史发展表

时代	代表人物	内容	媒介	对象	目的
国家产生前 <sup>a</sup>	所有人	击鼓献玉	神	所有人	人的幸福
西周	周公	封建制、宗法制、井田制 （“尊尊”“亲亲”）	神和个人道德	贵族	封建统治
西汉	董仲舒	三纲五常 （“尊尊”“亲亲”）	天	贵族+	封建统治
北宋	朱熹	三纲五常 <sup>b</sup> （“尊尊”“亲亲”）	理	所有人 <sup>c</sup>	封建统治

注：a 这里的时代根据孔子的观点，即夏商时期关于礼的记述不足，将时间倒推至国家产生前，即夏商之前。

b 董仲舒与朱熹都认同把“三纲五常”作为礼的内容，但二人的依据不同。董仲舒以阴阳论为根据，人有三纲正如天有阴阳。朱熹则以“理”为根据，“理”是先天客观存在的，因为三纲五常是礼的固定部分，礼又是理的体现，那么三纲五常也是客观存在的。

c 东汉开启“礼下庶人”的趋势，但并没有完成“礼下庶人”的过程，直到宋代“礼下庶人”才得以完成。北宋《政和五礼新仪》的颁行被视作“礼下庶人”的标志性事件，这是官方为庶人制作的礼仪法典。《宋史·礼志》是第一部记述庶人礼仪的正史。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没有人被排除在礼的作用范围之外，但此时的人仍有等级区分。官方将社会划分为皇帝和宗室、品官、庶人三个等级。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① [宋]朱熹著：《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93页。

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952页。

③④ [宋]朱熹著：《宋本论语集注一》（全四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72页，第42-90页。

⑤ 张凯作著：《北宋礼治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自序第9页。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礼治根源

传统上，中国社会是“礼治社会”。相应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基于儒家特有的“家国同构”“以礼治天下”等理念而建立，是典型的礼治体系，或者叫礼治秩序。<sup>①</sup>它始于周朝，复兴于汉朝，定型于宋朝。元明清三朝均延续了礼治秩序。清朝灭亡后，礼治秩序消亡，中国开启从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以礼治天下”思想亦逐渐淡化。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新中国政府均有其各自主张。但是，由于国家羸弱、国共内战，以及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尚未正常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很难在赓续礼治上有所作为。得益于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梦的实现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复兴。构建一套发扬自身文明传统及革命与建设经验、吸收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价值观体系，并将之应用于指导新的外交实践，势在必行。如果说传统东亚国际体系是礼治体系，当代中国倡导构建的主要聚焦周边的东亚国际体系，则可被称作“新礼治秩序”或者“中华礼治秩序”，其主要特点是：“礼”成为秩序（体系）的关键粘合剂；它是一种圈层结构；这个体系具有开放性。<sup>②</sup>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礼治之纲

新时代四大外交概念的主要内涵、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sup>③</sup>，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领域<sup>④</sup>；“一带一路”与伙伴外交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大抓手，其中“一带一路”侧重经济与文化领域，以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伙伴外交侧重政治与安全领域，以及针对发达国家的外交。生态领域是“一带一路”与伙

<sup>①</sup> 黄枝连著：《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三卷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sup>②</sup> 薛力：《“中华礼治秩序”初探》，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5期，第73页。

<sup>③</sup> 张宇燕主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6页。

<sup>④</sup> 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中，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内涵，即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和生态体系，这五大内涵大致上分别针对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生态五个领域。参见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伴外交共同关注的领域。<sup>①</sup>

从新礼治秩序的观点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礼治的纲领。“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出现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sup>②</sup>此后，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共十九大报告等重大外交场合和重要政策文件中，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诠释得更加清晰。报告共有五处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人类多层次的追求，包括人类整体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国家行为体以及国际社会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追求等。<sup>③</sup>

上文梳理了礼自产生以来的作用对象以及不同时代的作用目的，借此视角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传统礼治秩序既有关联又有差别。从周公制礼希冀确保周朝世代永继，到董仲舒为论证汉武帝统治的正当性提出“君权天授”，再到朱熹以“理”释礼为宋代封建社会伦理秩序提供先天性合理的解释，中国传统礼治的目的都是维护历朝君王的权力。“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sup>④</sup>的理念贯穿于中国封建王朝，直到封建社会发展接近尾声，庶民的地位仍被置于皇帝和宗室以及品官之下。<sup>⑤</sup>

不同于传统礼治维护中国君主统治的目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新时代的表现，“互相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内涵。因而，新礼治秩序的核心理念是世界的和

<sup>①</sup> 薛力：《中国传统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载《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23期，第33-35页。

<sup>②</sup>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sup>③</sup> 中共二十大报告包括15部分，共有5处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5处的位置以及原文分别是：第一部分“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第三部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十四部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sup>④</sup>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7页。

<sup>⑤</sup> 宋代《政和五礼新仪》确立了这一包括三个等级即皇帝和宗室、品官、庶民的封建社会模式。这个等级模式延续到明代和清代，从《明史》和《清史稿》中都可得到印证。参见杨志刚著：《中国古代礼学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69-82页。

平与稳定。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实质上标志着新礼治时代的开端。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外交之总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全球文明倡议等其余五个外交概念从各自领域出发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动力。为实现“明昭有周……允王保之”<sup>①</sup>这个周朝永继的目标，周公从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和经济发展角度入手分别制定了封建制、宗法制和井田制。周公制礼作乐通过这三种具体制度的施行才得以完成，“惟其必融凝此三者而始成为一治体，故于政治制度之背后，有伦理道德焉，有经济实利焉。惟此三者之相融相成，故礼成而乐兴焉”<sup>②</sup>。同样，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共享”目标也需要从具体领域分别入手，中国对此给出的答案是“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sup>③</sup>。

## 三 伙伴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之礼治根源及相互关系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相对有限，主权概念产生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民族国家概念则滥觞于法国大革命。诞生于基督教世界的民族国家具有明显的内外之分与敌我对抗性，这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内在缺陷，也是一神论国家频频发生宗教战争的深层原因。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亦与此密切相关。中国则延续了数千年的天下体系（即“礼治体系”），遵循的是另外一套哲学。首先，迥异于基督教文明的上帝崇拜，中华文化强调祖先崇拜，并且是以家族为中心，构建具有明显圈层性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有序运转。这种社会的特点有二：一是等级制，二是亲疏有别但不存在明显的敌我二分与对抗性。其次，基于“家国同构”的逻辑，天下治理同样依据社会治理的逻辑，例如，家族有“五服”，天下也区分为“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sup>④</sup>；家族有“九族”，天下亦有“九服”<sup>⑤</sup>。最后，天下治理中讲究华夷分别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治理，因此，天下礼治体系又称作

① 王秀梅译注：《诗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51-752页。

② 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第96-97页。

③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④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8-90页。

⑤ 吕友仁、李正辉译注：《周礼》，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7-298页。

华夷秩序。这里的“华”通常包括甸服、侯服与绥服，采取直接治理模式；“夷”（也包括“藩”）则是指要服、荒服，采取间接治理模式。后者大致上相当于现在的国际关系，这也是中外历史学界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共识。

中国传统礼治随着朝代更替，适用对象的范围在逐渐扩大：西周以贵族为主体，北宋时期大致实现了以所有人为主体的。但此时的礼治主体仍有明确的等级性，皇帝及宗室、品官和庶人三个级别等级分明。此外，中国传统礼治的目的是维护历朝君王的权力，而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提出的两个代表性外交理念，它们以保障中国全体人民共同的物质丰盈和安全利益为目标，同时以中国为中心引领全球和平与发展。因此，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可被视作中国在新礼治时代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贡献力量的两大抓手。

### （一）两大抓手的礼治根源

伙伴关系是伙伴外交的结果。伙伴外交是新中国在冷战结束之际开始遵循的外交理念，它继承了传统中国礼治时代的“尊尊”“亲亲”思想。其中，“尊尊”对应于中国伙伴关系形成的等级性，如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关系等；“亲亲”对应于伙伴关系发展的圈层性，在中国与全球六大洲国家形成的伙伴关系中，与亚洲国家的伙伴关系数量最多。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可追溯至古丝绸之路时期的天下秩序观，即华夏中原和四方夷狄共治天下。

#### 1. 伙伴关系与“尊尊”“亲亲”

“伙伴关系”概念最初于1970年由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提出，他在《7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国情咨文中提出被称作“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外交战略，它由“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三部分组成。其中，“伙伴关系”意为“美国要加强同北约盟国、日本以及其他自由国家的关系，鼓励它们分摊更多负担，承担更大责任，与美国一起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sup>①</sup>。尼克松希望美国利用“伙伴关系”与西方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对抗苏联。国际社会出现伙伴外交的热潮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sup>②</sup>，到冷战结束时，中国外交已经走上“无敌国”的轨道<sup>③</sup>。中

<sup>①</sup> 肖月、朱立群编：《简明国际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

<sup>②</sup>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

<sup>③</sup> 牛军主编：《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7页。

国的伙伴外交始于1993年12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巴西时，双方就建立长期稳定、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sup>①</sup>彼时，冷战刚刚结束，全球化成为国际上主要国家的共同诉求。中国致力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

历经30多年的发展，如今中国的伙伴外交已相当成熟，并表现出圈层性和等级性特征。伙伴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显著特色，中国也是最重视伙伴外交的大国。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的伙伴关系分为中国与大国、与周边国家和与发展中国家等层次，并为每个层次制定相应指导方针。根据外交部等网站的信息统计，中国目前已经与118个国家、6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发展形成124对伙伴关系。<sup>②</sup>这118个国家在全球六个洲的分布数量从大到小依次是：亚洲39个、非洲27个、欧洲25个、大洋洲11个、南美洲10个、北美洲6个。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的6个国际和地区组织是：非洲联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阿拉伯国家联盟（战略伙伴关系）、拉美开发银行（战略合作关系）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这124对伙伴关系可大致分成10个等级。<sup>③</sup>

上述中国伙伴外交的圈层性和等级性特征可从中国的传统礼治秩序中探寻根源。《礼记·大传》记载了当时社会的礼治原则“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sup>④</sup>。“亲亲”和“尊尊”分别代表宗法制和等级制，这表明西周时期以宗法等级制作为维持社会秩序最基本的准则。彼时的统治阶级认为，宗法等级制不可随朝代更替而变革。这也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作为汉代统治思想中的核心要素，其中“君臣”代表“尊尊”，“父子”代表“亲亲”，这一思想也得到

<sup>①</sup> 任远喆著：《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历史发展与现实途径》，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88页。

<sup>②</sup> 2023年11月9日，笔者在外交部网站查到114个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国家的信息，另外4个伙伴关系国（吉布提、马达加斯加、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的信息是通过中国商务部网站、中国政府网等查到。

<sup>③</sup> 这10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巴基斯坦）、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互惠关系。其中，战略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和战略互惠关系内还有等级划分，如战略合作关系包括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关系。笔者将专文探讨中国的伙伴外交。

<sup>④</sup>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656页。

宋代朱熹的认同。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特征。他认为，在中国古代，人们之间的关系如同石子丢入水中形成的一圈圈波纹，离中心越远形成的波纹就越浅。他认同孔子推崇的“人伦”观念，并认为“伦”就是差序，“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这个社会结构的架格是不能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的事”<sup>①</sup>。当今中国的外交实践同样以这一架构开展伙伴外交。上述富含中国特色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战略合作关系等伙伴关系分层体现出等级性特征，而中国与118个国家发展的伙伴关系在全球各大洲的分布则体现出圈层性特征。

## 2. “一带一路”倡议与天下礼治秩序

这里需要简要介绍“中国”“天下”等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以便深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礼治根源。

“中国”这个词汇出现于西周初期，它是“华夏”的同义词，与“蛮夷”“夷狄”相对应。“夷狄”指代古代中国周边民族，“夷”位于中国东方，“狄”位于中国北方。《礼记·王制》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sup>②</sup>天下秩序又被称作华夷秩序，它以华夏中原与夷狄的关系为要义。夏商周三代是华夏族团（汉族前身）从多元走向统一的过程，春秋强调“夏夷之防”，至战国已形成“中国”与“四夷”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的整体观念。<sup>③</sup>从历史上来看，由“夷族”变为“华族”是常见现象，典型如周朝、秦国、唐朝君主所属的家族皆经历了这个过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sup>④</sup>，华夏和夷狄的区别并不在地域、族群、种族，而在于是否接受以“礼”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因此“礼”是区别华夷的最高准则。<sup>⑤</sup>从中可见，对不同类型的族群“以文化之”是中华文明的关键特征。

<sup>①</sup>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31页。

<sup>②</sup>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64页。

<sup>③</sup> 陈连开：《中国·华夷·藩汉·中华·中华民族——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81页。

<sup>④</sup> [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sup>⑤</sup> 陈连开：《中国·华夷·藩汉·中华·中华民族——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86页。

“一带一路”倡议来源于古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可追溯至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旅”。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映射到华夷秩序，体现在汉武帝对中国周围族群的整合，从而构成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背景。得益于张骞的凿空之旅，东西方通过丝绸之路交往日益增加，西域受到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汉宣帝时设置西域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在一定意义上，古丝绸之路也意味着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影响力拓展。

## （二）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之相互关系

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两个代表性概念，伙伴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是新礼治秩序的两个抓手，共同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sup>①</sup>。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代表了新礼治秩序的进行时，上文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国际社会的视角出发，旨在维护各个国家的和平与发展，追求各国人民的物质丰盈和精神幸福。伙伴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则分别以维护中国的和平与发展为主要目标，受益对象涵盖国际社会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sup>②</sup>在发展对象上，伙伴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分别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重点；在发展领域上，伙伴外交注重政治和安全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关注经济和文化领域，生态领域则是两者共同关注的部分。

伙伴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循环。伙伴外交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开局，“一带一路”的共建则促使伙伴外交提质升级。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正值中国伙伴外交开展20年之际，中国已同58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伙伴外交的已有成果为“一带一路”的开局打下基础。以“一带一路”架构下的六大经济走廊为例，其中四大经济走廊位于亚洲：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这四大经济走廊的开展与中国和其中主要国家间的伙伴关系直接相关。其中，被视作“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进展比较迅速，这与中国和巴基斯坦间的“巴铁”友谊关系重大。巴基斯坦是最早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之一，1996年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

<sup>①</sup>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中表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参见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第2版。

<sup>②</sup> 截至2023年6月底，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载《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1日第10版。

系，此后两国关系又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中蒙俄经济走廊提出后在三国政府间的沟通较为顺利，这得益于中国与蒙古、俄罗斯的伙伴关系。<sup>①</sup>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伙伴外交发展增添动力，这可从2013—2018年间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得到印证。从数量上看，中国在2013—2018年间与48个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其中，2013年和2014年建立的伙伴关系数量较多，分别为16个和12个。随着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出台，中国伙伴关系数量在2015年和2016年又增加了16个，其中包括新加坡、沙特、伊朗等“一带一路”国家。从质量上看，在“一带一路”倡议出台前，中国伙伴关系在全球各地区分布的比重差距相对较大，其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亚洲22对、欧美22对、拉美7对、非洲6对、大洋洲1对。经过2013—2018年间的发展，其数量变化为：亚洲38对、欧美28对、拉美17对、非洲16对、大洋洲8对。<sup>②</sup> 尽管排序依旧，但此时中国伙伴关系的地区分布相比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更加均衡。

#### 四 全球文明倡议：礼治根源与中西价值观差异

中国在2021年推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推出全球安全倡议，2023年推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三大全球性倡议分别从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文化”属于“道”，而经济、安全等属于“器”。因此，下面先从比较视角探究三大文明倡议与周代礼治的关系，然后比较全球文明倡议在价值观层面与西方文明的差异。

<sup>①</sup> 中蒙经历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3年）、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的伙伴关系历程。近30年来中俄关系持续向好，两国先后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年）、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年）。中国外交部指出：“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并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参见：《驻叶卡捷琳堡总领事崔少纯会见新西伯利亚市长洛科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3年5月23日。<https://www.mfa.gov.cn/web/> [2023-12-11]。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认为，俄中关系目前为历史最佳。参见：《俄外长拉夫罗夫：俄中关系目前历史最佳》，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3年2月3日。<https://sputniknews.cn/amp/20230203/1047599443.html> [2023-12-11]

<sup>②</sup> 王晨光：《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1期，第69-73页。

### （一）全球文明倡议的礼治根源

《周易》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sup>①</sup>，意为：事物由看不见的形上之道和看得见的形下之器构成。《周易》提出的这一“道器”思想在中国传统礼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提出的礼之“天理化”便借鉴于“道器”思想。从“道器”思想视角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发现，全球文明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它为此前出台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提供内在之“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器”。这与周公制礼的道理相通。周公通过制定封建制、宗法制和井田制完成制礼作乐，三者分别从政治安全、伦理道德和经济发展入手以达到保障周朝政权的目标，其中，宗法制居于核心位置。西周封建制的要义是分封姬姓诸侯，使宗室成为巩固王权的重要力量，因此封建制发挥力量的源泉在于宗法制。井田制则是宗法制的外在显现，宗法制在观念上形成的等级性外显于井田制中不同宗族被分封土地的层级上。因此，宗法制也就是封建制和井田制的“理”，是周公制礼的“道”。

正如周公制礼作乐由宗法制、封建制和井田制构成，三大全球性倡议从不同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周公制礼标志着中国传统礼治时代的开启，三大全球倡议则擘画了新礼治时代的蓝图。具体来看，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间的关系，类似于宗法制与封建制和井田制间的关系，全球文明倡议为全球发展和安全提供内在支撑。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得到尊重的前提下，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有望得到保障，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才有望落实。钱穆对周公制礼中三种制度的评价是“惟此三者之相融相成，故礼成而乐兴焉。谓其厘然有当于人心之所同乐也”<sup>②</sup>。

然而，在西周时期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人心同乐实际上不易实现。钱穆此话用于评价三大全球性倡议更为合适，它们从“器”与“道”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新礼，致力于全球人心同乐。

### （二）中西文明的基本特征：对立统一与二元对立

全球文明倡议的主要内容是四个“共同倡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

<sup>①</sup> 杨天才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600页。

<sup>②</sup> 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第97页。

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sup>①</sup>

全球文明倡议把全球所有国家的人民视为一个整体，同时，把全人类根据文明特性分为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相互间彼此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实现不同文明的美美与共。全球文明倡议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前面阐述了全球文明倡议与儒家所奉行的周礼的关系，这里有必要指出，全球文明倡议还体现了道家的“天下无外”理念，以及道家与儒家共同接受的“和而不同”理念。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不同文明的平等性，进而强调不同文明的互鉴与对话。这展示了中国政府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剔除了传统文化中明显的等级性、轻视其他族群与文明的弊端，以适应现代性框架下对平等性的普遍诉求。

基于“天下无外”的理念，中华文化必然赋予不同族群与文化以生存的权利与空间，并强调不同族群与文化的“和而不同”。这里，有的是“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sup>②</sup>的常识，而没有“强化对立、消灭他者”的信念与逻辑，其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的核心特性“一阴一阳之谓道”<sup>③</sup>。在这里，阴阳对立是相对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为“反者道之动”<sup>④</sup>。

基督教的哲学基础是上帝乃世间唯一的真神，民众被分成截然对立的“教徒”和“异教徒”。<sup>⑤</sup>教徒与上帝订有契约，是上帝的选民，因此有义务把上帝的福音传播给异教徒，通过软硬兼施手段让异教徒皈依上帝。这至少带来两个逻辑后果：教徒的救世主情结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这在欧洲历史上已引发无数的冲突与对抗，其中包括一系列宗教战争。救世主情结在美国则表现为“新世界”意识、把自身当作“山巅之城”的执念、“美国例外论”、“价值观外交”，等等。二元对立思维在美国外交上则表现为对“结盟”与“树敌”根深蒂固的偏好，这在当代表现为热衷于拉帮结派来构建各种排

①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载《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2版。

② 方勇译注：《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7页。

③ 杨天才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571页。

④ 富强译注：《道德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40页。

⑤ 张宇燕、高程著：《美国行为的根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他性俱乐部，借以打压不受其待见的国家与文明体。因此，基督教文明很难变成一种真正包容性的文明。所谓的政教分离，其效果也只是将教徒们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如“民主”与“威权”的对立。

总之，全球文明倡议折射出中华文明的特色及其创新性发展，既适应了时代对平等性的普遍诉求，也凸显了相比于基督教价值观更具包容性的特质。

## 五 总结与探讨

本文梳理了中国传统礼治秩序典型时期的“礼”之特征，以展示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发展脉络，并据此探究新时代中国外交代表性概念的礼治根源和相互间关系，进而探寻新礼治秩序下的中国外交特征，即新时代中国外交特征。

在国家产生前，古人通过击鼓献玉向神祈福。到了西周时期，周公希冀周朝世代永继，他通过封建制、宗法制和井田制完成制礼作乐，此前“神统治人的幸福”的思想被打破，“人”的因素进入统治思想中，“尊尊”“亲亲”自此成为维持中国封建伦理等级社会的核心思想，不过此时礼的主体是当时的贵族阶级。到西汉时期，董仲舒通过提出“天人合一”思想为汉武帝的统治提供正当性，他借助“天”的合法性为“三纲五常”提供合法性，这时礼的主体尚未完成从贵族阶级到所有人的扩展过程。到北宋时期，朱熹通过以理释礼为当朝政权的统治提供先天合理性。礼的主体完成了从贵族阶级到所有人的扩展过程，但人被官方划分成皇帝和宗室、品官、庶人三个等级，这个三等级的社会结构一直维系到清末。基于“家国同构”的原则，传统的天下体系实际是一种礼治体系。它始于周朝，复兴于汉朝，定型于宋朝。元明清三朝均延续了礼治秩序。清朝灭亡后，礼治秩序消亡，中国开始了从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以礼治天下”思想也逐渐淡化。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梦的实现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复兴。为此，中国有必要构建一套新的价值观体系以指导新的外交实践，即构建“新礼治秩序”。

新时代的中国外交以不同时期提出的外交理念为要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则是中国外交的代表性概念。它们不仅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问题，也意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被视

作新礼治时代开启的标志。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传统礼治时代的开端，“尊尊”“亲亲”作为宗法制的核心理念由此一直延续到清朝，其最终目的是维持君主的统治。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将传统礼治时代的目标转化为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践行全球治理，让东道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实现政治上结伴合作、安全上共享和平、经济上共同发展、文化上交流互鉴、生态上携手共治的局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它包括五个领域。伙伴外交继承了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核心理念——“尊尊”（等级性）和“亲亲”（圈层性），“一带一路”倡议则可追溯至汉武帝时代五方之民共治“天下”的天下秩序。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大抓手，是构建新礼治秩序的进行时，它们分别从安全和发展的视角入手，以中国为中心、以点带面推动世界的安全与发展。此外，两者还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循环，伙伴外交为“一带一路”倡议开局打下基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则为伙伴外交提质升级助力。

作为“新礼治时代”的三个全球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礼治之纲，分别从经济、安全与文化三个领域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文化”属于“道”，而经济、安全等属于“器”。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间的关系，类似于宗法制与封建制和井田制间的关系。全球文明倡议折射出中华文明的特色及其创新性发展，既适应了时代对平等性的普遍诉求，也凸显了相对于基督教价值观更具包容性的特质。

（责任编辑 黄念）